

HIV / AIDS COUNSELORS INTERVIEW

艾滋病咨询员访谈录 下册

我想对你说 梁苹 杨可 / 编著

I WANT TO TELL YOU



Yunnan Daytop Drug Abuse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



APCASO
ASIA PACIFIC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ORGANIZATIONS
亚太艾滋病服务机构委员会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HIV / AIDS COUNSELORS INTERVIEW

艾滋病咨询员访谈录 下册

我想对你说

梁苹 杨可 / 编著

I WANT TO TELL YOU



一次成功的咨询可以挽救
一个生命、一个家庭、
也可以及时阻断艾滋病的传播

SUCCESSFUL COUNSELING IS POWERFUL
ENOUGH TO SAVE LIVES, GIVE HOPE TO
FAMILIES, AND STOP HIV/AIDS.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目录

生命的感悟	4
燕过留痕	12
刻骨铭心的痛	20
挣扎的凤凰	28
责任重如山	36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44
多一点温情多一点爱	50
宽容，是我最大的收获	56
挂电话那一刻，我满怀成就感	60
泪水，是我的咨询“工具”	66
别怕，我就在你身边	72
我选择快乐	78
爱心，是一个沉重的字眼	86
生命，需要满怀敬畏	92
守住底线，可以生活得更好	96
活下去，就是生命	100
后记	104
写在最后	108

CONTENTS

Apprehend Life	4
Story of Yanzi (the Chinese Synonym for Swallow)	12
Unforgettable Memory for a Failed Case	20
A Struggling Phoenix	28
Responsibility is as Heavy as a Mountain	36
Life is a Best Teacher	44
More Warmth, More Love	50
Toleration is What I Learnt	56
After Ringing Off, I am very proud of my job	60
Tears function Like Tool During Counseling	66
Don't Be Afraid, I am by Your Side	72
I Choose to Be Happy	78
Love is not a Simple Word	86
Due Reverence to Life	92
To Guard the Base Line	96
Live Still, I am Life	100
Postscript	104
Final Words of the Author	108

Apprehend 生命的感悟 Life

叙述：霍俊丽

访谈时间：2008年8月

霍俊丽印象

在一群人中间，霍俊丽会被忽略，因为她很安静。然而霍俊丽又是那种不仅不可能被忽略，而且必须被重视的女孩，因为她有一种很强的“内功”，一种让自己自信的内在力量。在艾滋病咨询员中，霍俊丽是少数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心理学硕士的背景使她比别的咨询员拥有了更多优势。然而，真正让她与众不同的是那种敏锐的直觉和通透的悟性。每一个咨询员都会有工作带来的困惑，有的人通过谈话交流来解惑，有的人通过运动娱乐来转移，霍俊丽则通过阅读和思索来寻求出路。走出迷途，她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答案，而且是一份心智的成熟。

在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科工作半年以后，我被调到了咨询组。科里的领导说，让我结合自己的心理学专业背景，开展艾滋病咨询工作。尽管有老同事善意地提醒我：“艾滋病咨询工作很烦，时间干长了，人的精神会受不了。”但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心里除了对新岗位有点忐忑外，更多的还是兴奋。

真真实实地感受到艾滋病咨询工作的压力，是在加入咨询组四周以后。前四周的时间，我一点一点地熟悉VCT的工作流程，慢慢地，新鲜感消失了，心里更多的是满满的困惑；此外，就是对求询者，我常常感到爱莫能助。当一个又一个HIV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感染者走进咨询室，用充满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时，我的心里总会激荡起一阵惶恐。我总会无奈地想：无论自己说什么、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被病毒感染这个严酷的事实。而HIV感染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背负了一座痛苦沉重的大山。由于自己四年专业背景的关系，掌握熟练的咨询技巧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怎样通过我的咨询工作，让我的求询者能够把那座生命之中的冥顽大山从心头卸下，重新鼓足对生活的勇气，充满快乐和渴望地生活在人间。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专业知识，鲜鲜活活地运用到实际的咨询工作中。我的咨询工作做得十分机械，就像流水作业一样，生搬硬套地完成着每一个咨询流程。当求询者眼神暗淡地低头走出咨询室时，我不仅没有获得任何成就感，反而为自己空泛无力的说教感到深深的惭愧。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命，唤醒了在麻木和自责中久久沉睡的我。一直以来，我碰到的HIV感染者都是成年人，尽管我心里对这些人有同情和怜惜，尽管我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是被动感染者，但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惨痛结局，除了被动感染者之外，的确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而让病魔缠身。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稚气的孩子感染HIV。我一直十分喜欢小孩子，尤其珍爱他们的娇嫩和纯真。小孩子就像一张洁白的纸，生命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所以，当那个三岁的小女孩，眼里满是恐惧地走进我的咨询室时，我的心因为痛苦而扭曲了。

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被感染了HIV的小孩子，她的父亲因为吸毒感染了HIV，刚刚离开人世。悲惨的是，母亲和孩子也一同被感染了。她身体瘦小、脸色煞白，胆怯的眼神，拘谨的举止。她用双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臂，哭着小声问我：“阿姨，妈妈说我要死了，是真的吗？阿姨，我好害怕，你救救我，好吗？”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脑子里老是浮现出那小女孩可怜的样子以及她对我所说的那些祈求的话。我反复追问自己：我能为她做什么？难道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我决不允许自己再这样无动于衷。我告诉自己：必须找到突破口，否则我的咨询生涯将会像死水一样沉静，对社会无所作为。

那几天，我始终处于一种心神不宁和惶恐不安之中。一个偶然的时机，我找到了改变现状的契机。由于从学校毕业后，老师一直十分关心我的工作，于是我找到我的班主任老师，向他谈起了我目前面临的困惑。老师淡淡地笑了，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你去看看弗兰克尔的书，也许对你会有所启发。

弗兰克尔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一家被投入德国纳粹集中营，其父母、兄弟、妻子皆死于集中营。弗兰克尔凭着坚强的毅力得以生还，出狱后，就其集中营的苦难经历，写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弗兰克尔具有的心理学研究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双重经历，让他对人生有着常人没有的感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一篇评论中曾经写道：“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财产，他所有的价值观都被践踏得

粉碎，他每天都面临饥饿、寒冷和暴行，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拉出去处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怎么还能觉得生活值得继续下去呢？”支持弗兰克尔在这样的绝望中活下去的是他的发现：人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丢失不了的，是在丢失了所有别的东西之后还会有的。这就是：人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环境下，都有选择自己心态的自由。他为自己选择的心态是：接受现实；在囹圄之内发现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绝望地期待着奇迹的出现。看来，对于很多人，只有当死神真正逼近时，生活的意义才彰显出来。

读完这一段话后，我合上了书卷，一个人在明亮的灯光下沉思。我回顾了我自己目前的工作，有了自己在VCT生涯的第一次顿悟。今后，面对我的求询者，我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也不再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所作为。艾滋病是一个社会问题，HIV感染者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改变，必须是整个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才行。比如，社会歧视、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等。作为一名咨询员，我们最神圣的责任是：帮助患者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点亮他们的生命之灯，让他们在药物的支持下，走好人生的整个行程。

我继续在书卷的海洋中摸索。当我看到英国心理学家哈德斐尔德的实验后，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哈德斐尔德曾给两组志愿者进行过不同的催眠。他对第一组的人说：“你现在身体非常非常虚弱，你已经变成婴儿了，你全身都很细小，你的手指像小鸟爪子那么瘦……”慢慢地，这些人真的相信了。这时，给受测者一个握力器，受测者的平均握力是29磅。然后，他也对第二组人进行了催眠：“我现在往你口中滴的是营养液，是拳王泰森服用的那种。所以，你会像泰森一样强壮，越来越强壮。”此时，他又让这些人去握握力器，结果平均握力是142磅。而事实上，这两组人在清醒状态下的正常平均握力都是101磅。

在对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需求调查中发现，多数的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在等死。”“我认为自己活不长了。”面对这些消极的求询者，咨询员首先要告诉他们：艾滋病并不意味着绝望和死亡，抗病毒治疗可以让许多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且能够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找一份工作或是参加一个感染者互助小组，都可能从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工作不仅可以让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自食其力，更重要的

是体现自身的价值。对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来说，感染者互助小组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融入其中就不会再感到孤立无助，就有了同一性和归属感。所以，如果我们咨询员总是给求询者一些正性的“催眠”，求询者自身的力量就会增强，甚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一次培训课上，云南省戴托普中心的杨茂彬主任告诉我们：咨询是一种态度！这让我对“态度”一词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体会，更有了VCT生涯的第二次顿悟。何谓“态度”，用佛家的话说，就是见心见性，即心中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

在艾滋病咨询中，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一群与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价值观不一样的社会边缘群体，比如，吸毒人群、暗娼、嫖客以及男同性恋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我们格格不入。这常常会让我们做咨询员的在内心深处产生矛盾冲突。如何理解这些边缘人群？把他们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从而唤起对他们的关爱和怜惜，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真正有了理解，就不会以自己想当然的价值观去看待他们、要求他们。庄子在《庄子·逍遥游》里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宋国人想到越国去卖帽子。这个宋国商人按照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觉得越国地处蛮荒之地，没见过帽子，自己要去那儿卖的话，肯定生意兴隆。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越国人“断发文身”，意思就是剪了头发，身上刺着花纹，风俗习惯和中原地区完全不同，根本用不着帽子。他因此失望而归。我们在咨询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会从意识深处觉得，这些感染者罪有应得，这就是我之所以干不好咨询工作的根本原因。

从此，我放平了自己的心态，宽容地理解求询者身上的某些行为。我们理解求询者的某些行为，并不表示赞同这样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自己也会这样去做。只是，我们千万不能够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求询者的指导者、教育者。其实，我们只是在咨询室里和求询者进行交流的人。我们必须尊重求询者的个人隐私和价值观，尊重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个体。

有咨询员同行把我们的工作形容为“社会垃圾收容站”，这也同样体现出了咨询员不同的态度。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别人的“垃圾站”，那你工作起来会越来越没有积极性，会越来越觉

得郁闷。如果你对自己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的，那么你工作起来的压力就会减少很多。于丹在谈《庄子》心得时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三个人在路过一个墙角的时候，看到了同样一个情景，一只小蜘蛛往墙上爬，爬着爬着，前面有一块被雨润湿了的地方。小蜘蛛一爬到潮湿的地方就掉下来了，然后，这只蜘蛛又从墙角开始爬，再爬到那个潮湿的地方，又掉下来了。如此一遍一遍，周而复始。这三个人看到这个场景，都想到了自己的生命。第一个人想：我看到这只蜘蛛，就像见到了我自己。我和这只蜘蛛是一样的，一生就这样爬上去再掉下来。人的一生注定是碌碌无为、周而复始地做着徒劳的努力。第二个人想：我看见蜘蛛这样爬，才知道人生其实有很多误区。我们只看到眼前，以为只有一条路，其实潮湿的那一块地方并不大。如果这只蜘蛛能横着绕过那个地方，它很快就可以顺着干墙爬到更高的地方。所以，我要让我的人生变得更聪明。有的时候，人生就需要绕路走。第三个人看到蜘蛛以后，被深深地感动了：一只蜘蛛都能够这样不屈不挠，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这样，应该有多少能量可以激发，有多少奇迹可以创造？这一切，完完全全都可以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待生活中的事情，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去想，怎么去看。从小蜘蛛的经历，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获得不同的人生感悟，对艾滋病的咨询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呢？关键就看我们咨询员如何去认识，如何去想象。香港心理学家岳晓东把咨询的感觉形容为“一种登天的感觉”，只有怀有这种心态，我们才能从咨询中获得自身的完善和进步。所以，积极的暗示不仅仅适用于对我们的求询者，对我们咨询员自身也是一样的。

在艾滋病咨询流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询问求询者的高危史，做临床危险前景的评估。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错误地以为，这是咨询员查找求询者身上存在的毛病，作为下一步做治疗干预的基础。所以，当我按照这样的思路开展咨询时，总想找出求询者自身的问题。结果是，我和我的求询者都感觉很不舒服。求询者认为我戴着“有色眼镜”，这种不平等让他们极为反感。对于我自己，这种把咨询当作任务的感觉，也让我压力很大。我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小鹰，它从小跟着鸡群一起长大，小鹰也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小鸡。所以，当主人真正要放飞这只鹰的时候，无论怎么诱惑，怎么打骂，鹰就是飞不起来，因为它认为自己是

一只不会飞的小鸡。最后主人失望了，说：“我白养了一只雏鹰，一点儿用处都没有。我把它扔了吧。”主人把这只小鹰带到了悬崖边，像扔一只鸡崽一样撒手将小鹰扔下悬崖。小鹰垂直地从悬崖上掉下去，在急速坠落的过程中，这只小鹰扑棱扑棱翅膀，坠地之前竟突然飞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在从悬崖下落的过程中，鹰的天性被激活了，恢复过来了，它知道了自己的翅膀是有用的。这个故事告诉我，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有自我发展的潜能。于是，我有了自己VCT生涯的第三次顿悟，我决定把自己从事的艾滋病咨询工作重新定位。尽管我所面对的是那样的一群社会边缘人，但我依然相信，他们身上有着我没有发现的优势，有着能够自我发展的巨大潜能。

有了新的定位，我的咨询工作就有了转变。我开始自然而然地与求询者聊天，不让彼此感觉到压力和不适。在艾滋病的咨询过程中，求询者面临着很多次的重要选择，比如说，咨询后是否做检测，感染了HIV的孕妇要不要生下孩子等。我相信，求询者有自我决策的能力，我不能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于是，我总是让他们对自己负责。这样，求询者感到了我对他们的尊重，增强了自信心。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真正会帮助别人的人，就是让对方学会帮助自己！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在自家院子里观察老母鸡孵育小鸡，等到小鸡要出世的时候，母鸡翅膀下的蛋壳一动一动的，一个个小脑袋纷纷伸了出来，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小男孩看到有一只小鸡用小嘴儿努力啄开蛋壳儿，笨手笨脚地想从蛋壳里钻出来，可始终就是出不来。小男孩心想：“小鸡啄得这么吃力，我过去帮帮它吧！”于是，小男孩走过去，用手把蛋壳剥开。小鸡出来了，可出人意料的是，这只小鸡畏缩不前，不像其他小鸡一样活泼，更不会自己去寻找食物吃，成了一只病态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鸡要成长，就要经历一些痛苦的过程。作为咨询员，要相信求询者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要“好心”去剥夺了求询者自我发展的机会。

现在，我从事艾滋病咨询工作快两年了，尽管有些求询者让我头疼，也有些无理取闹的求询者让我气愤，但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求询者开始了新的人生，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非常有价

值！每天，我都能听到求询者不一样的人生故事，感受到他们不一样的悲伤和无助，心理上确实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但我竭力做到，不受自己的工作影响，该放下时且放下。就像一个佛家故事说的那样：小和尚和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在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小和尚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二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二十里路还没放下？所以，只有学会放下，我们才能让自己在工作中不受到伤害，才能让自己从工作中逐步成熟起来！

2006年，有一首歌唱得很红，歌名叫做《隐形的翅膀》。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只是我们要善于去寻找它和发现它。我愿意把自己心中的这双翅膀，放飞到所有求询者的晴空之上，帮助我的所有求询者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那双翅膀，飞得更高、更远！

Story of Yanzi

(the Chinese Synonym for Swallow)

燕过留痕

叙述：燕子

访谈时间：2008年7月

燕子印象

见到燕子，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四个字——“造化弄人”。如果没有这场疾病，她应该在哪里？遭遇下岗这样的事，也许就够她辗转折腾上几年。可是疾病不容许她过多地暗自神伤，她必须与时间赛跑，跑着调整自己的心态；跑着帮助别的感染者，能帮忙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能安抚情绪的安抚情绪；跑着带领自己的女儿比同龄人更快地成长，跑着累着，累着哭着，哭着也笑着。

她在我面前一句也没有抱怨过自己的丈夫，在她的心中家庭始终是一个巨大而无可替代的后盾，支持着她投身在VCT这份事业中。她一直强调自己是个幸运儿，这种感恩之心，使得她把有限的精力、体力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她游走在全市各大医院之间，用自己的执著和专业精神改善着原本淡漠的医患关系，更把自己无限的爱传递给那些和她一样深陷顽疾的人。

我听她讲述着她帮助过的一个个感染者，看着她为别人流的眼泪远超过为自己流的。她就像一个天使，上帝跟她的人生开这个“玩笑”唯一的理由，就是请她来帮助更多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己不惑之年还可以拥有别样人生的。她只是想通过工作，尽量把自己的经历与其他感染者分享，让大家知道，其实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就叫我燕子吧。我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做VCT工作，我自己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干这行时间长了，或多或少地要面临着身份曝光的可能性。对我个人而言，曝光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是，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所以我首先得尽力保护我的孩子，让她不要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之下。因此，我活得很累，瞒得很辛苦。

我是通过丈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2005年冬天，由于突发肺炎，被送进医院时，我已经命悬一线。刚刚脱离危险期的那天，医生就告知我被感染的消息。之前，我只是一个淹没在人海当中、最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正经历着下岗的生活危机，对艾滋病一无所知。艾滋病的突如其来，对我和我的家庭而言，不仅仅是晴天霹雳，更是雪上加霜。白天的时候，面对医生、护士和其他病友，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只要夜幕一拉开，我就深深地躲进被子里面，浑身瑟瑟颤抖，夜夜以泪洗面。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后该往何处去。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虚脱变形了。我拒绝见女儿，不敢面对她。我害怕一个喷嚏或者一次触碰，就会把病毒传染给她。我不敢告诉父母，内心深深地自责和惭愧。别的父母都由子女侍奉着颐养天年，而我的父母却要和我一起背负起没有尽头的万劫苦难。

然而，比起很多其他的病友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我碰到了两个最好的人——我的主治医生和护士。那位年长的护士每次为我输液拔针时，都不戴橡皮手套。那位医生临床经验丰富，如果不是他，三年前，我可能就已经死在医院白色的抢救室里了。后来，他们看到我萎靡不振，就通过别的医生，给我介绍了一位艾滋病同伴。正是这个同伴，把我引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记得那一天，我和他在医院下面的小花园里见面。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他的病情和康复心得。他还说起了艾滋病防治的现状和当时活跃在昆明的一些防治艾滋病的非政府组织，并且送给我一大堆关于疾病的诊治资料。看到他得病后这么多年，还活得如此健康阳光，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受难者，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跟我一样同病相怜却在勇敢抗争的人。后来，他带我到一个艾滋病组织里参加培训活动。我记得，我激动了很久很久。虽然通过培训，我只是学到一些有关疾病的简单介绍，但是对于蒙昧无知的我而言，那些知识简直就像阳光一样珍贵。我开始知道，我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对自己负责，只需要坦荡地面对现实。如果自己没有暴露性的伤口，我就可以和周围的人进行正常的交往和接触。我还知道了，令人生畏的艾滋病病毒，其实只要用酒精轻轻擦拭，就可以消灭干净。从此，我心里多多少少有了底，就回到了家里，和父母、兄弟、女儿住在了一起。

参加活动的次数多了，我便结识了更多的伙伴。2005年年底，通过一位伙伴的介绍，我得以同一个NGO的总负责人见面，并开始在那里工作。

我的另一个幸运在于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家人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更没有让我放任自流。他们一直是我最强硬的后盾和依靠，特别是我的妹妹和妹夫，他们两人的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宽裕，从我入院开始，他们除了承担我所有的医疗费用外，还负担起我整个家庭的开销。记得当时，妹夫和妹妹来医院看我，妹夫很自然地坐到我的床边。我让他离我远一点，他淡淡地说：“没关系，我知道这个病是怎样感染的，因此我不害怕。”当时，国家治疗艾滋病的药品还没有出台减免政策，我和丈夫一个月光吃药，就需要六千多块钱，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日常开销，以及抚养孩子的各种费用，对我们而言，那真是一笔巨款。然而，我的妹妹吩咐我只管

安心养病，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考虑。她和我的妹夫主动承担起这一切开销，还专门请来一个保姆，照顾我一家老小的日常起居。这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家庭来说，真是太奢侈了。可是，他们总是用一句“一家人，不要在乎那么多”来宽慰我。之前，妹妹和妹夫正计划着要生养一个小孩，我生病以后，妹妹和妹夫经过慎重考虑，毅然决定暂时放弃这个计划，把我的女儿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后来，我在培训时以及在与其他患者的交流中，反复听到“歧视”这两个可怕的字眼。然而，在我的真实经历中，却从未感到被歧视。我不能不说：“我很幸运，我一生碰上的都是好人，是他们给了我同情、给了我理解、给了我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好人，我的人生之路不知会有多少坎坷。”

从2006年开始，在一位项目专家的鼓励下，我们机构得以同香港乐施会接洽，商谈共同实施防治艾滋病的项目。我和我的同事拟写了项目申请，通过层层审核，终于在2006年10月，得到了第一期二十多万元人民币的艾滋病项目启动资金。这笔资金，主要用来帮助解决艾滋病患者治疗急性机会性感染疾病。在第一期项目结束之后，我们又申请到十多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连同一期项目的剩余款，一起用来继续开展帮助艾滋病患者的活动。

对于我这样一个当初被单位淘汰的下岗女工而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为了工作，我逮着机会就请教年轻同事，硬是把电脑操作学会了。虽然我打字很慢，可是基本的收发邮件、打字制表、上网查找信息，我都能够完成。在我的同事当中，有和我一样的感染者，也有没被感染的正常人，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芥蒂或者界限。那些小伙子、小姑娘每每看到我饭盒里有好吃的菜，都会忍不住伸出筷子抢一点尝尝。作为感染者，我们更懂得互相体谅。有时工作量实在太大，看谁状态不太好，我们都会互相照顾、互相分担。这里有外人无法体会的良好的工作氛围。最初，我丈夫的身体情况要比我的好很多，但是三年下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远远没有我的好了。这得归功于VCT的工作，它使得我有机会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了解关于艾滋病的一些最新信息，不断地与周围的同伴接触和交流。因此，对自己的病况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心胸也更加豁达一些。

在工作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地感觉到，个人的力量或者某个组织的力量是何等的渺小。虽然，艾滋病患者形形色色，有的人根本就不懂得反思和感恩，可是，也有的人像我一样，很无辜，是被动感染上的。看着他们因为经济或者精神方面的原因，一天天憔悴下去，陷入绝望，生命就像一只急速燃烧的火柴，很快就将走向熄灭和消耗殆尽。这个时候，我只能干瞪着双眼，有心无力，束手无策。压力会像一块越来越重的石头，紧紧地压迫着我的心房，一直到不能呼吸。

我有一个病友，在整整八个月的“同伴教育”中，我亲眼看着他从刚开始的微恙，到病情的逐步恶化。他一直是独自一人到医院打针，从来没有任何亲朋好友来陪伴和探望。他衣着讲究，待人彬彬有礼，但从不愿意与人交流。我一次次希望和他深谈，希望能够帮助他打开痛苦的心结，对他进行辅助治疗。但他始终不愿意和我谈论自己，始终与我客气地保持着距离。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他美丽的妻子终于出现了。可那时，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我曾经建议他妻子，立刻把他转送到省艾滋病关爱中心接受更加专业的治疗，话还未说完，就被他妻子严厉地打断。她说：“我们一家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认识他的人知道他得的是艾滋病，宁肯死，也不会！”

今年3月，我在泰国接受培训的时候，接到他妻子的越洋电话，她小声地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她说她恨他，因为他把病毒也传染给了她。但是，她还是放不下他，所以一直陪他到生命的最后。现在，轮到她自己等待时间做出“最后的审判”了……

接了这个电话，我难过极了。我想，本来他的病情不重，完全可以控制住的。可这个我跟踪了那么长时间，用尽气力又拉又拽的人，最后还是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悲哀。我和我的同事，经常讨论，假如我们中了五百万元的彩票，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多少个病患，可以挽救多少个人的生命。可是，精神支柱的崩溃，是任何金钱也挽救不了的。

多恩在《连祷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因疾病而饱受焦虑之苦，当疾病真正到来之前，我们就已支撑不住了……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当疾病的传染性使那些本该前来助一臂之力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时……这是对病人公民权的剥夺，是将病人逐出社会……”